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9036787

10位ISBN编号：7309036786

出版时间：2003-10-1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许纪霖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内容概要

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一个专业化和学院化的时代。后现代的大潮，颠覆了知识元语话的合法性。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夹攻下，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否还有可能，又如何可能？在本书中，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学界的许纪霖，将近年来最新的思考奉献给有着共同精神关怀的读者们。其中，既有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也有对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以学理论证思想，以思想提升学理，成为本书的特色所在。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作者简介

许纪霖，1957年生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中国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问题研究。

出版有《无穷的困惑》（1988）、《智者的尊严》（1992）、《中国现代化史》（主编）（1995）、《寻求意义》（1997）、《许纪霖自选集》（1998）、《另一种启蒙》（1999）等著作。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书籍目录

自序1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2 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3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4 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5 瓷器店中的猛牛6 一代豪杰“傅大炮”7 紧张而丰富的心灵8 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9 走出阁楼以后10 激情的归途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章节摘录

书摘 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还是有其渊源和前身。

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

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书面的文字，它才需要一种特别的人，一种掌握文字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

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

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分离出来的。

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

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

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

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

如中国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

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展。

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

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就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

从语用学的意义上，要看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

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

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

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算作知识分子。

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

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

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

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

根据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

从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这一划分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和语用功能。

然而，即使从职业角度，也有问题。

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工的建立，还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

最早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业余的或半业余的，是自由职业者。

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是“自由漂浮者”，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既可以独立于任何阶级，也可以服务于任何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具有同质和异质两重性。

同质性是指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异质性是指政治观念主张可以完全不同，可以归属于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

如果知识分子真的像毛泽东所说是一根“毛”的话，早期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需要“皮”，它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飘荡。

葛兰西将这种知识分子看做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然而，随着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随着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张，当代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职业化，不是进入正式知识体制中的大学、研究院，就是成为商业机制中的签约作家，成为体制里面的人物。

他们不再像波希米亚人那样四处漂游，而是逐渐有机化，开始依附于一定的“皮”之上。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乐意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帕森斯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在1979年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一书，将知识分子归在一个所谓的“文化资产阶级”名下，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批判性话语文化)，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话语的生产和分配)，并认为这个阶级正在成为社会中的新的统治者。

新阶级首先具有文化资本，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其次拥有共同的话语规则，其规则在于：交谈者之间的最后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权力或权威，不受情境影响，即所谓的情景无涉性，而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

古尔德纳用“文化资本”的概念分析知识分子，这可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影响。

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知识分子正是那样一批掌握了文化这种象征资本的人，他们拥有权力，并且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享有某种特权。

但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金钱的压迫，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敢于对抗国家理性，乃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相信自己掌握并且代表了更高的理性——人类的理性，这一理性是整体的，具有终极性的价值和依据。

在启蒙时代，当知识还没有分化，而人类又普遍陷入蒙昧状态的时候，人类理性的确起到过很大的解放作用。

然而，到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分化，知识也日益分化，各种知识之上是否还存在、或者说还有必要存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整体知识？这一点如今已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列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证明了所谓的元话语——整体性知识的虚妄性，当整体性知识所造就的两套宏大叙事——关于真理的叙事和革命的叙事被颠覆之后，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知识论依据就被釜底抽薪，失去了立足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知识分子依然执著地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万能钥匙，可以凭此谈论或批判一切现存之物，就显得格外的虚弱和空洞。

已故的中国作家王小波以热爱知识和理性而著称，但他最讨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以为代表了无所不在的真理，夸夸其谈，误国误民。

他在其杂文自选集的序言中，开篇就讲了一个故事，说自己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他印象极深：工业巨头见到多年不见的儿子，问他对什么有兴趣。

儿子在科学、文艺、法律一切方面皆无所长，但他说自己学会了一样本领，善于明辨是非。

父亲听完嘲笑儿子说，这件事连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都感到犯难，而你什么都不会，倒是专于明辨是非？王小波说，他看了这段戏之后，痛下决心，这辈子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王小波是敏感的，在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中期，看到了太多的业余知识分子，明明没有什么研究和思考，却整天忙于出境，在媒体夸夸其谈，对一切问题都敢于发表意见，善于发表意见。这样的学术文化明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成为媒体商业时代的普遍现象。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波斯纳(Richard Posner)最近发表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对这些在各类媒体频频曝光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无情的抨击，指出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为公众提供的是信用品，在公共消费市场是需要事后检验的。

然而，如今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论，却不必为其是否拥有信用而负责。

这样，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就呈现出公共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少。

在左拉生活的时代，社会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知识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分化，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多是通才，可以跨越不同的领域针对社会而发言。

然而，如今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异常复杂，人文的因素与技术的因素掺杂在一起，假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仅仅凭形而上的普遍知识实施批判，在公共事务的消费市场上，很难与那些维护现存秩序的技术专家竞争。

后者可以用种种复杂的技术方式遮蔽事实，做出辩护。

无所不能的传统知识分子，在技术专家面前，往往是一无所能，无法让公众相信他们所说的具有足够的公信力。

不过，也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反驳说：很多社会问题，不要搞得那样复杂，只要凭简单的生活常识，只要凭心中的良知，就能够分清是非！对此，王小波辛辣地说：“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

”常识并非是客观的存在，它是多少年历史传统的积累；常识并不是永远可靠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已经不是过去生活智慧之积累——常识所能回答得了。

常识只能在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中发挥合法性功能，如同过去的传统社会一般。

而当今世界变化之快，很多问题远远超出常识的解释半径之外。

即使是常识管用的地方，由于各人所经历的经验不一样，他们所拥有的常识经验也不同。

谁也不可能拥有对常识的最终解释权，一切只能取决于公共领域中公众之间的理性讨论。

知识分子不能仅仅凭常理而发言，公众的交往理性是比个人的常识更可靠的东西。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永远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

为了避免传统知识分子缺乏自身的立足点，而被政治所否定，徐复观将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足点首先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

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知识人，“站在学术的立场，总是以探求普遍而妥当的绝对真理为目标，并且各人对自己所认定的真理总是要负绝对的责任”。

这个绝对的责任是在学术上而言，是对自己所信奉的真理的追求，并且对真理负责，担负其相应的责任。

这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卫“道”传统在现代的延续。

不过，传统知识分子相信“道”是绝对的，而且只有一个是正统的，但在徐复观看来，现代社会的真理是多元的，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绝对的，个人对真理的追求就是要“唯”，但对社会来说，却有许多对立的真理的存在，“任何学术上的真理，只能作为是一个可以变动的相对真理。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学术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对于政治有其独立性，这是知识分子保持自己学术尊严的依据所在。

即使当学术的意见应用到政治领域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人，也只能对自己学术上的真理负责，因为“任何学理上的东西，在政治上形成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必须或多成少的打点折扣”。

在这里，徐复观划清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在承担政治角色之间的重大区别：政治家所遵循的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必须对自己所作的政治决策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而知识分子则不同，他在诉诸社会舆论时，所遵循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即依据自己的知识真理，对社会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只需对自己的学术良知负责，而不必像政治家那样直接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因为从知识分子的言论到实际的社会后果之间，要经过多道曲折和中介，政治家不能因为现实的理由来打压知识分子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但对我来说，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却纯属偶然，不是我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我。

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

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

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

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为什么要考文科呢？实际上，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

但我对文科却有一种偏爱。

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上海的文科生只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那个时候华东师大和上海师大合在一起，我们进校后分开了)。

我填报的志愿都是与新闻、中文、历史有关，但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这是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在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选择专业，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政治。

我选择了政治专业。

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

但在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党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

我从事的第一个研究就是《黄炎培传》，接下来又做了一个《沈钧儒传》。

我的研究生涯是从中国民主党派研究开始的。

一般民主党派研究专家都把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史来研究。

但我这个人常常想法比较特别，我喜欢文学，因为文学更多地涉及人的心灵和人性。

别人从民主党派历史中看到是政治，我发现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纯属偶然，完全是兴趣的导引。

我的最早的两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都是在1987年发表，一篇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刊登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另外一篇是《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一期。

前一篇文章我考察了古代的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历史演变。

后一篇文章我是从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写的《忏悔录》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灵与肉”之间的冲突。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1987到1989年连续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系列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文化热”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新华文摘》在一年时间里三次转载。

我几乎是一夜暴得大名，完全是我最初意想不到的。

我一开始做这些研究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关怀和热情驱使。

这些文章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现在回过头分析，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恰恰出现了“文化热”，现在被称为“新启蒙运动”。

它的主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屡受曲折？问题究竟在哪里？当时的知识分子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

因此，“文化热”的主题就是用西方文化来批评中国传统文化。

反思传统文化，同时也反思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本身。

我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与当时中国思想界这个热点有关系，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幸运的成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分。

当然，这也与我的思想比较敏锐有关。

我并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专业兴趣的人，对于当下思潮的变迁常常有一些观察和思考，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并将当下的问题意识转化到历史研究中去，我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缺乏独立人格，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

这是我当年提倡的一个中心理念，它在与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普遍的反响。

.....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编辑推荐

既有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也有对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以学理论证思想，以思想提升学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的特色所在。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